

清代诗人结社丛考

——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朱则杰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杭州 310028)

摘要:清代浙江省会杭州,诗人结社活动非常兴盛,各种社团层出不穷。其中“蕉园诗社”“南屏诗社”“古欢吟会”“潜园吟社”“东轩吟社”“铁花吟社”等有些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诗社,学术界已见研究。而其他还有不少社团,则目前缺乏探讨。文章就魏成宪“苔岑兰会”、邹绅“古藤书屋诗社”、汪曾唯“千龄会”三个社团做考察,或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清诗;结社;杭州;苔岑兰会;古藤书屋诗社;千龄会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1-0005-08

Textual Research on Civil Societies Formed by Poets in Qing Dynasty

—Centered on Hangzhou Region

ZHU Ze-ji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Poet association activities were most dynamic and various societies emerged in endlessly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Qing Dynasty. Some large poet societies with great influence, such as “Jiaoyuan Poet Society” “Nanping Poet Society” “Guhuan Poet Society” “Qianyuan Poet Society” “Dongxuan Poet Society” “Tiehua Poet Society”, have been researched in academic world. Many other societies are lack of exploration at present. Now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ogether three societies, Wei Chengxian’s “Taicen Lanhui”, Zhoushen’s “Guteng Shuwu Poet Society” and Wang Zengwei’s “Qian Ling Hui”, may make up the insufficient.

Key words: Qing poems; association; Hangzhou; Taicen Lanhui; Guteng Shuwu poet society; Qian Ling Hui

清代诗人各种各样的结社,在古代历史上无疑最多。但学术界关于清代诗人结社的专门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这方面有待考察的具体社团、需要总结的普遍规律,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问题,都有

收稿日期:2014-10-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A751074);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36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3NDJC024Z)同名“清诗续考”

作者简介:朱则杰,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诗歌研究。

大量的工作可做。本文所取三个社团,同属浙江杭州地区,即厘为一束。

一、魏成宪“苔岑兰会”

魏成宪《清爱堂集》卷首有其《仁庵自记年谱》(仁庵其号),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仁庵年五十八岁”条曾说:

春三月三日,与莫淮山(淮)、高未堂(家骏)、朱友鹤(邦经)、高迈庵(树程)修禊雅集,五人合三百四十一岁,皆丁酉同年也。自是,月必有集,略仿“真率会”。迈庵作《苔岑兰会图》,各赋一诗,同人题者甚众。^{[1]10}

又“同人”之一陈灿《师竹斋稿》卷三《题春松观察〈苔岑兰会图〉,即次元韵》二首,即为魏成宪(春松亦其号)而作,题注说:

封户部主事钱塘莫淮,年八十有五;前龙游县教谕仁和高家骏,年七十有三;杭州府训导嘉兴朱邦经,年六十有三;直隶州州判仁和高树程,年六十有二;前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仁和魏成宪,年五十有八,嘉庆癸酉三月三日集饮于杭郡学舍,赋诗作图。^[2]

现在以这两条记载作为基本线索,将“苔岑兰会”的有关情况大致整理于此。

首先关于社团性质。“苔岑兰会”成员凡五人,每人都有当时的年龄记载,以齿为序。其中最小的魏成宪,也已经五十八岁。五人合计,确实为“三百四十一岁”^①。平均年龄,则为六十八岁有余。因此,魏成宪年谱说是“略仿”北宋司马光等人的“真率会”,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耆老会。

其次关于成员科举。这个耆老会内部,借以连接五位成员的纽带,是“皆丁酉同年也”。这里的“丁酉同年”,指的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科浙江乡试。其中莫淮、高家骏、魏成宪三人为该科举人,高树程为该科副贡,这都没有疑问^②。唯独朱邦经,据光绪《嘉兴府志》卷四十七《选举·四》“国朝·举人”栏,乃是“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恩科乡试”举人。^[3]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两年前的正科曾经获得过副贡,至少参加过乡试,所以尽管至恩科才正式考取举人,而魏成宪等人仍然视之为“丁酉同年”。至于年龄最大的莫淮,清末丁申《武林藏书录》卷下“耳食录”条^[4],以及后世不少著作(具体从略),每每称之为“诸生”(秀才),则明显属于错误。又年龄最小的魏成宪,在举人之后还曾经考取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科二甲第四名进士,与这里的“丁酉同年”无涉。

再次关于社团名称。上述五人以乡试“同年”而集会唱和,形成社团,并绘为画图,图名曰“苔岑兰会”。“苔岑”一词,典出晋代郭璞《赠温峤》诗:“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苔同岑。”后世用来称意气相投的挚友。某些唱和类总集,或名“苔岑集”;某些社团,或名“苔岑社”“苔岑会”之类,都是取义于此。这里的“苔岑兰会”,添一“兰”字而构成四个字的词组,主要应该是从图名高雅的角度考虑。而由于该社团未见有其他的称谓,所以我们也就以这个图名来作为社团的名称。同时,从这里的所添之字是“兰”而不是“诗”“吟”之类,则可以进一步佐证该社团的性质更多地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耆老会而非诗社,没有把诗歌唱和作为主要的追求。

最后关于集会活动。“苔岑兰会”的集会,始于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的三月三日,亦即上巳节。按照魏成宪年谱的说法,从那以后,“月必有集”。考魏成宪《清爱堂集》,除卷一、卷二《经进存稿》上、

^①吴振棫辑《国朝杭郡诗续辑》卷十一录有陈灿该组诗歌第一首,而题注误高家骏“年七十有三”为“年七十有二”,如此则与“五人合三百四十一岁”抵牾,见光绪二年丙子(1876)钱塘丁氏刻本,第9a页。

^②见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十二《选举·六》“国朝·举人”、卷一百十三《选举·七》“国朝·副榜”,《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册,第1012页、第1033页。

下之外,其他各卷诗歌都既分小集,又明确编年。其中“苔岑兰会”集会之作,见于卷十五《北山精舍存稿·下》,具体为《三月三日,同莫滩山(滩),高未堂(家骏)、迈庵(树程),集朱友鹤(邦经)学舍,五人皆丁酉同年,经今三十七载,合三百四十一岁,即席有作》《四月二十日,友鹤招同滩山、未堂、迈庵复集斋中,即用前韵》两题各一首^{[1][112]},同属“昭阳作噩”亦即“癸酉”年作品。从这两题来看,的确符合“月必有集”的规律,并且地点都在朱邦经官为训导的杭州府学。

另外这里的第二题,尾联云:“图留雅集分题好,神妙秋毫欲到颠。”又上句自注说:“迈庵作《苔岑兰会图》,同人题之。”据此可知,《苔岑兰会图》应该作于第二次集会之际,并且五人都有过题诗。可惜的是,除魏成宪之外的其他四人,他们或者本来就没有诗集,或者已有的诗集又未能传世,所以我们无法读到他们的作品,也无法借以考察“苔岑兰会”的集会与唱和的情况。

而在魏成宪《清爱堂集》内,自第二题之后,也没有再看到接续之作。这一方面也许是像一般耆老会一样,虽然仍有集会,却并无诗歌创作;另一方面也可能虽然仍有诗歌创作,却在后来编定诗集时未予保留。不过最大的可能,恐怕还是“月必有集”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

前引魏成宪年谱该年条,紧接下去记载:“同年蒋砺堂制府书币见招,因作粤游,冬杪始达羊城。”《清爱堂集》卷十六,即为《粤游草·上》,其中有确切时间的第五题是《十一月十五夜,玉山对月》。^{[1][115]}“粤游”以后,魏成宪又长期接连在外地游历服官,“苔岑兰会”自然不可能再参加了。莫滩等人年事已高,估计也很难续会。这样综合推算,“苔岑兰会”的集会活动,大概就终止于该年的十月以前,头尾最多只有八个月。

“苔岑兰会”虽然活动时间不长,成员也不多,又不是专门的诗社,但它对于此后杭州地区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创立的“潜园吟社”、道光四年甲申(1824)创立的“东轩吟社”,以及光绪四年戊寅(1878)创立的“铁花吟社”等大型诗社^①,客观上未尝不具有某种先声的意义。例如这里的前两个诗社,分别绘有《潜园吟社图》和《东轩吟社图》,这个做法就同“苔岑兰会”绘有《苔岑兰会图》相一致。而在此前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高树程曾经随其父亲高瀛洲参加过杭州“古欢吟会”的第一次集会^②,这无意中又使“苔岑兰会”与“古欢吟会”产生了直接的联系。

此外,“苔岑兰会”作为一般的耆老会,对于考察成员的享年下限特别是生年也有着特殊的作用。该五人之内,魏成宪有自记年谱,可置不论。高树程系著名画家,当时与奚冈齐名,现今传世的画作仍然很多,而过去很长时间人们不知道他的生年;今人陈军、王小红两位先生合写的《明清浙籍书画家生卒考》一文第六条“高树程(1752——?)”(生乾隆十七年壬申)^[5],似为最早予以考定者,而依据正是前引陈灿组诗的那段题注。另外朱邦经,曾见乔晓军先生编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小传已有生卒年的记载^[6],其生年推算也与陈灿该题注正相吻合。而余下两人,据该题注逆推,莫滩出生于雍正七年己酉(1729),高家骏出生于乾隆六年辛酉(1741)。这样,像麦群忠、朱育(玉)培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莫滩小传称其“生卒年不详”^[7],现在生年也就可以先补出了。

①依次可参朱则杰:《“潜园吟社”考》,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第20-27页;《〈清尊集〉与“东轩吟社”》,载《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72-178页;《“铁花吟社”的社诗总集与集会唱和》,载《诗书画》2013年第2期,第246-253页。其中“东轩吟社”这篇又见朱则杰《清诗考证》第二辑之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上册,第665-682页。

②参见胡媚媚硕士学位论文《清代诗社研究——以六诗社为中心》下篇第三章《古欢吟会》第二节《“古欢吟会”的主要成员》,浙江大学2013年5月,第126页。该章又载《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题作《“古欢吟会”考论》,第72页。

二、邹绅“古藤书屋诗社”

清末丁丙辑《武林坊巷志》“羲同坊·三”所属“斜桥”条,从邹志初《墨稼稽斋文钞》录有一篇《古藤书屋诗社图记》:

入武林城不百步,稍折而南,曰“斜桥”,河沿有屋数椽。丁亥之夏,家大人率子若妇自北墅迁居于此。厅事之旁,曰“古藤书屋”,以院植藤花一本,近百年物,因取竹垞翁旧额颜之也。青阳告谢,朱明肇授。花珑珑而表色,叶蓑蓑以擢茎。大人周览庭隅,怡颜发咏,首用竹垞集中韵成七古一章,兄仲继之。翌日,同人来,咸集花下,促膝谈咏[永],联吟趣豪,亦各用竹垞韵成诗,共若干首。大人曰:“俯仰景光,流连翰墨,情之所至,道亦存焉。今日之会,少长咸集,宾主勿愆。诗人清谈,并双[只]鸡而不设;良友入座,觉林鸟之并欢。与前贤为唱酬,作文字之知己。韵事也,亦古怀也,不可勿识。”于是图而藏之。图中凡十人:大人自为社主,兄仲侍焉,曰吾师吴良[良]石先生鉴,曰蔡木龛焜,曰蒋琴溪梅,曰俞浣花薪传,曰魏雨人谦升,曰钟笑溪莱[荣],曰邵位西懿辰,曰吴继园理宗[综]。时道光戊子夏四月。绘图者,吴小艾瀾也。^{[8]第7册,707-708}

这篇记文,记录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古藤书屋诗社”。

一般的诗社,它们在创立之前,通常都有立社的明确动机;但这个“古藤书屋诗社”,起先却并没有想到立社。又一般的诗社,在创立之后,通常都有多次集会的行动,至少会有这样的愿望;但这个“古藤书屋诗社”,实际上却只相当于一次集会,包括首日的“社主”父子唱和和“翌日”的“同人”“咸集”“联吟”,而此后再没有继续集会的设想。因此,这里的“古藤书屋”唱和,本来仅仅是一次一般意义上的集会唱和。然而,从这篇记文来看,它却明确取名为“诗社”,并且绘有“诗社图”,同时其主持人也称作“社主”。这作为诗社,的确可以说是一个特例。

“古藤书屋诗社”的“社主”,即邹志初的父亲邹绅。据记文所述,他于道光七年(1827)“丁亥之夏”迁居于城内的斜桥,辟有“古藤书屋”。诗社的创立,则在大约一周年之后的道光八年“戊子”(1828)夏季四月间。其活动地点,也就在这个“古藤书屋”。

“古藤书屋诗社”的成员,一共有十人:邹绅之外,为邹志初的仲兄邹志路,及吴鉴、蔡焜、蒋梅、俞薪传、魏谦升、钟荣、邵懿辰、吴理综。他们的籍贯,都是浙江钱塘或仁和,即今杭州。有关生平事迹,基本上可见丁申、丁丙兄弟合辑的《国朝杭郡诗三辑》。以下结合这些人物,对若干相关情况再做些考察。

先从社长邹绅说起。邹绅原名约,字去泰,更字袖湖。岁贡。继母是清代中叶著名诗人兼骈文家胡天游的孙女,“博通经史”,所以邹绅自幼就“禀承慈训”^①,受到良好的教育。其生卒年此前未见明确记载,现在则可以考知:冯云鹏《扫红亭吟稿》卷十四编年诗道光九年“己丑”(1829)《十月朔日,偕吕心渊、丁宝年谒至圣林,观红叶,用前人“霜叶红于二月花”句,为辘轳体五首》之后,有《初三日,寿邹袖湖封翁六十晋九四首》^[9],逆推即邹绅生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生日很可能就在十月初三日(公历10月30日)。又《武林坊巷志》“平安坊·二”所属“双眼井巷”条,据《邹氏宗谱》所录第三子邹志初(“初”字误作“步”)传,其中叙及:“戊戌会□[试]即归,冬间遭袖湖公丧,哀毁甚至。”^{[5]第5册,376}这里“戊戌”为道光十八年(1838),邹绅当即卒于该年冬天,享年七十八岁。《国朝杭郡诗三辑》卷十五邹绅名下所附诗话,末尾说他“甲子未周,遽捐馆舍”^{[10]19a},不知何据。

邹绅第二子邹志路,字义衢,一字仲虎,号狷斋。嘉庆二十四年己卯(1819)优贡。曾官任宁海训导。

①语见丁申、丁丙辑《国朝杭郡诗三辑》卷十五邹绅小传及诗话,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刻本,第19a页。

有诗集《狷斋遗稿》五卷传世,新出《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入第585册。影印本卷首作者小传(无页码),已考得其生卒年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至咸丰十年庚申(1860),享年六十七岁,从所注资料出处推测盖依据《狷斋遗稿》最末第三篇女婿方熊祥跋^{[11]665}。此外《武林坊巷志》“平安坊·二”所属“水陆寺巷”条,据《邹氏宗谱》所录其子邹在寅传,其中叙及:“咸丰庚申正月,父仲虎公遽故。”^{[8]第5册,397}这个谢世时间也与方熊祥跋所说相吻合。今人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四十二邹志路、卷四十六邹志初小传^{[12]1353},提及邹志路别号“仲虎”,“虎”字均作“麓”,恐误。

此外邹绅长子邹淦,原名志春,字与曾,号铁樵,一作铁桥。前及《武林坊巷志》“平安坊·二”所属“双眼井巷”条,据《邹氏宗谱》录有其本人及诸子侄小传,可知其“生于乾隆甲辰年(四十九年)三月初二日”亦即公元1784年3月22日,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中式第七十名举人”^{[8]第5册,375},曾长期在外地做官,卒于“咸丰六年[丙辰,1856]……冬十一月”^{[8]第5册,377},享年七十三岁。兄弟三人,都是诗人。并且邹淦妻子陈采芝、女儿邹坤成,邹志路妻子汤湘芷,也都工诗。前列“古藤书屋诗社”最末一位成员吴理综,则是邹坤成的丈夫,亦即邹淦的女婿。由此可见,邹绅家族,正是所谓一门风雅,诗歌世家。“古藤书屋诗社”的创立,的确良有以也。

“古藤书屋诗社”成员中的吴鉴,不仅是记文作者邹志初的老师,而且至少也是邹志路、蒋梅、钟荣三位诗社成员的老师。《国朝杭郡诗三辑》卷十八所录吴鉴《同朱清泉先生、蔡藕船舅氏,暨蒋琴溪、钟笑溪、邹仲虎各生,过山舫,看湖上新绿,小颠烧笋饷客,因纪以诗》^{[10]33a-b},标题中就称这三人为“生”。因此,“古藤书屋诗社”的成员结构,师生显然也是一层重要的关系。

“古藤书屋诗社”的成员魏谦升,以及记文作者邹志初,同时也是同时期杭州“东轩吟社”的正式成员。另一成员蔡焜,与邹绅同居斜桥;虽然不见于“东轩吟社”的成员名单,但其家却是“东轩吟社”集会唱和的一个重要场所。前及《武林坊巷志》“羲同坊·三”所属“斜桥”条,辑录蔡焜资料十分丰富^{[8]第7册,700-707},其中大量即与“东轩吟社”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两个诗社之间的联系。

“古藤书屋诗社”虽然只是一个一次性的诗社,但它的成员后来在不少方面,却有过引人注目的业绩和声名。例如钟荣,后来更名世耀,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举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其子钟骏声,则咸丰十年庚申(1860)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所以平步青《霞外摭屑》卷一将其列入“词林嘉话·父子翰林”条^[13]。又如邵懿辰,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更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两次攻陷杭州之际,这两位诗社成员以及其他许多成员和家属包括邹坤成、汤湘芷等,或劳瘁而卒,或“殉节”而终。邹淦的长子邹在衡,就专门撰有《邹氏恩恤全录》,从事后朝廷“恩恤”的角度记录了邹氏一门的这段历史,俞樾为之作序^①。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诗社成员的诗文著作大量失传,或者不能完整保存。

“古藤书屋诗社”当时创作的社诗,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邹志路所作的一首,见于《狷斋遗稿》卷四最末^{[11]658},前及《武林坊巷志》“羲同坊·三”所属“斜桥”条亦曾据以辑录^{[8]第7册,707}。该诗题作《紫藤花歌,用竹垞老人集古藤书屋再饯梁孝廉韵》,体裁为五言古诗。所和清初著名文学家兼学者朱彝尊(竹垞其号)原诗,系多人联句,题为《古藤书屋再饯梁孝廉》^②,而体裁同样也是五言古诗。前引邹志初该记文,谓邹绅“首用竹垞集中韵成七古一章”,邹志路“继之”,又“同人……亦各用竹垞韵成诗”。仅仅根据这个叙述,不能确断他们所和的朱彝尊诗究竟是同一首还是不同的首。假如是同一首,那么这里的“七古”应该是“五古”之讹。《武林坊巷志》一书,在传抄、排印过程中本来就多有错误,可

①见俞樾《宾萌集》卷五《邹氏恩恤全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

②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第16b页。

置不论。邹志初《墨稼稿斋文钞》，据前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名下著录，仅南京图书馆藏有稿本，不知其中是否收有这篇记文，也不知原文究竟是“七古”还是“五古”，日后如有条件则应当复核。

另外，丁丙《北隅缀录·续录》卷上“斜桥”条^[14]，介绍邹绅父子四人甚悉，并同样录有前述《古藤书屋诗社图记》和《紫藤花歌，用竹垞老人集古藤书屋再饯梁孝廉韵》，有关内容盖据《武林坊巷志》和《国朝杭郡诗三辑》各小传综合而成。

三、汪曾唯“千龄会”

清末谭献（原名廷献）《复堂文续》卷三有一篇《千龄初集记》，具体记载如下：

光绪纪元十有七载，岁在辛卯，月书春王，廿有二日，同乡十六人有“千龄”之集。……酒酣赋诗，伫兴偶作；疑年列坐，宾主可忘。周甲以下者亦豫，行将栗阶而登；寻盟相见也如初，此是倾衿之始。人同二八之升，算在千龄以上。……先是同治之初，乡有先达，结“九老”之会。星移物换，云散风流。此集继之，题名以纪，里乘可书矣。会者，姚大令近维震斋，年八十二，为祭酒；蔡孝廉玉瀛秋圃，年八十；高教授学治宰平，年七十八；韩州牧懿章聪甫，年七十六；汪秀才彝铨叔雅，年七十四；朱大令钰蓉湖，年七十二；许观察增迈孙，年六十八；张贡生弑子春，年六十六；高大令伟曾雋生，年六十五；许典籍郊子社，年六十五；汪大令曾唯子用，年六十三；张教谕景云寅伯，年六十二；谭大令廷献仲修，年六十；何训导学郑康来，年五十九；高中翰云麟白叔，年四十六；高部郎尔夔子韶，年三十五，所谓末座少年也。无达官贵人，试结布衣之好；有一门群从，可知乔木之家（高氏四人、汪氏二人、许氏二人）。异时或流为丹青，增成故事，未可知也。会后旬日，廷献泚笔记之。^[15]

这里所说的“‘千龄’之集”，属于耆老会的一种，通常即称作“千龄会”。“千龄会”早在宋代就已经相当流行，当然也有泛指一般的耆老会。真正的“千龄会”，顾名思义，其全体成员的年龄相加必须达到一千岁以上。这样按照人类的正常寿命推算，每个“千龄会”的成员总数，必定超过十个人。

谭献记载的这个“千龄会”，首次集会举行于清末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正月二十二日，地点在浙江杭州，所有成员都是“同乡”，一共十六人。十六人中，有三个人当时都不满六十岁，所谓“周甲以下者亦豫”；又最小的一个人，甚至还只有三十五岁，“所谓末座少年也”。这与一般的耆老会要求每个人分别都达到较高的年龄，显然并不相同。而十六人相加，则正如谭献另外在其《复堂日记·续录》中所记，“都一千五十一岁”^{[16]196}。这样作为“千龄会”，自然就是名副其实的了。

《复堂日记》记载本次集会，所有人物都略去其名而只用字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开头所说：“子用招延寿客，为‘千龄’之集。”^{[16]195}这既明确交代了本次集会的主人是汪曾唯（子用其字），同时又说明了集会的意图在于“寿客”。因此，如同一般的耆老会一样，这个“千龄会”的出发点，主要也是为了纪念长寿。当然，由于这些成员本身都是诗人，所以在集会的时候免不了也要赋诗。前引记文所说“酒酣赋诗，伫兴偶作”，一方面不免“赋诗”，另一方面只是“偶作”，这正符合一般耆老会的特点。它与“赋诗”为真的真正意义上的诗社，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这个“千龄会”，从谭献记文以“千龄初集”命题来看，它本来也应该还有“二集”“三集”等等，从而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会”。虽然我们目前所知只有“初集”，但它的计划或初衷显然并不局限于这一次集会。换言之，本次“千龄初集”，从理论上来说乃是整个“千龄会”的系列集会之一，而不同于一般所说的一次性集会。而汪曾唯作为“初集”的主持人，实际也就等于是整个“千龄会”的创始人。

这个“千龄会”的成员,其中汪曾唯是道光年间“东轩吟社”社长汪远孙的侄子,曾经为《东轩吟社图》征集题咏,并辑刻《东轩吟社画像》。又高云麟,明确为稍前光绪年间“铁花吟社”的重要成员。因此,这个“千龄会”尽管本身属于耆老会的性质,但它与此前杭州地区的诗人结社活动,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外谭献记文提到的“同治之初”同乡前辈所结“九老会”,指高锡恩(原名学淳)等人。《复堂类集·文》卷三《清故中宪大夫道銜候选府同知高[锡恩]先生行状》有关记载说:

咸丰十年(庚申,1860)、十一年(辛酉,1861),杭州再被寇。先生避地会稽一年,迁上海两年。乱定,逡巡归故居。一时耆旧,有吴督部振械、许抚部乃钊诸公,宦成家居,慕古“香山洛下”之会,与张中书应昌以下,有“九老”之游,先生与焉。诸老皆耆硕,乡党崇其学行。春秋佳日,一觴一咏,可以照耀山水,增成故实。^[17]

这里的“乱定”,就是“同治之初”。“九老”人物,从这里可以知道的有吴振械、许乃钊、张应昌、高锡恩四人。其中吴振械、张应昌,曾同时参加“东轩吟社”。而高锡恩,则正是高云麟的父亲、高尔夔的祖父^①。其他类似关系,还不遑一一考察。即便如此,也已经能够看出这个“千龄会”与“九老会”之间的联系确实相当紧密。

最后正如一般耆老会特别关注人物年龄一样,前引谭献记文以及《复堂日记》的重复记载,为考察“千龄初集”十六人的生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其中第三人高学治、第七人许增、第九人高伟曾、第十三人谭献,已见今人江庆柏先生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18];第十一人汪曾唯、第十五人高云麟,分别可见已故陈玉堂先生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小传(编号5924)^[19]、朱彭寿先生编著《清代人物大事纪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元1846年)·生辰”著录^[20];第二人蔡玉瀛、第十人许郊,则分别可见有关拙作^②。这八个人,推算生年各自都完全吻合,说明谭献所记确实相当可靠。余下八个人,现在也推算于次,刚好占总数的一半:

第一人:姚近维(震斋),年八十二

生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

第四人:韩懿章(聪甫),年七十六

生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第五人:汪彝铨(叔雅),年七十四

生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

第六人:朱钰(蓉湖),年七十二

生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

第八人:张斌(子春),年六十六

生道光六年丙戌(1826)

第十二人:张景云(寅伯),年六十二

生道光十年庚寅(1830)

第十四人:何学郑(康来),年五十九

①另外该行状曾连带叙及高锡恩长子、高云麟长兄、高尔夔之父高炳麟,称其“以同治五年(乙卯,1855)卒于越中”,见上引同页;而《复堂文续》卷四《七友传》之二高炳麟(磨)传则称“同治……四年(甲寅,1854)五月炳磨卒”,见同册第255页,两者必有一误。

②《清代诗人生卒年补考——以沈如焯等十位杭州诗人为中心》第三条“蔡玉瀛”,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3-14页;《〈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九位浙江籍作家为中心》第四条“许之叙”附,载《嘉兴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67-68页。

生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

第十六人:高尔夔(子韶),年三十五

生咸丰七年丁巳(1857)

当然,即使是这里的八个人,有的生年在别处也还可以找到线索,甚至还可能更加直接、具体。例如韩懿章,已故顾廷龙先生主编《清代硃卷集成》,还收有其咸丰八年“戊午”(1858)科乡试的硃卷,所记出生时间为“嘉庆丙子年闰六月十四日吉时生”^[21],一直具体到生日(公元1816年8月7日)。不过,即便如此,谭献所记依然有其自身的价值,至少可以起到佐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魏成宪.清爱堂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陈灿.师竹斋稿[M].杭州爱日轩刻本,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10a-b.
- [3]许瑶光,吴仰贤.(光绪)嘉兴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3:289.
- [4]丁申.武林藏书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66.
- [5]陈军,王小红.明清浙籍书画家生卒考[J].新美术,1995(4):37-39.
- [6]乔晓军.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134.
- [7]麦群忠,朱育培.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133.
- [8]丁丙.武林坊巷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 [9]冯云鹏.扫红亭吟稿[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65-466.
- [10]丁申,丁丙.国朝杭郡诗三辑[M].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刻本.
- [11]邹志路.狷斋遗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2]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 [13]平步青.霞外摭屑: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9.
- [14]丁丙.北隅缀录[M]//王德毅.丛书集成续编:第23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590-591.
- [15]谭献.复堂文续[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44-245.
- [16]谭献.复堂日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17]谭献.复堂类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9.
- [18]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64.
- [19]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548.
- [20]朱彭寿.清代人物大事纪年[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1357.
- [21]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第247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37.

(责任编辑 杨文欢)